

宋大川 主编

# 北京考古史

元代卷

孙勔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宋大川 主编

# 北京考古史

元代卷

孙勔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序

记忆的历史,有着不同的“版本”,比如神话传说,比如民俗,比如历史文献,比如考古学遗存,等等。它们都记忆着历史,它们是历史记忆的不同“版本”。宋大川先生主编的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不仅是北京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考古学遗存所认识的北京史。例如其中《史前卷》中的《附表》,即《北京史前考古大事年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这就是北京的考古学史。因此,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考古学遗存所认识,或所表述的北京史,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即北京的考古学史,便是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所涵盖的内容。这也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这两史各自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就一个人来说,也因时、因视角、因视点而异。我在此时此刻所要说的则是:

从北京的考古学史来看,我认为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一靠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二靠考古学的实践,三靠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没有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不会有考古学。没有考古学,哪来的考古学实践?没有考古学实践,哪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所以考古学要存在,要发展,就得做好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

同时,应指出的是,考古学史既有横向延展的历史,又有纵向发展的历史。移用现有的或他人、异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进行遗存的研究,即使有新发现,产生了历史的新认识,也只能称之为考古学的发现史。如果考古学仅停滞于这一层面,那么,它展现的历史,便只能算是考古学发现史,即考古学史中横向延展的历史。只有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考古学才能既出现横向的延展,又呈现纵向的发展。既有横向延展、又呈纵向发展的考古学史,才是全面的考古学发展史。这样的考古学发展史,应是中国考古学人的追求。当然,我希望北京的考古学人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更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的实践,虽是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创新的前提,但要实现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创新,则需勤于在考古学实践中增加一个“悟”字,这也是我对北京考古人的一点希望。

至于文物保护与考古学发展应当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个人历来主张应该是良性互动和推进考古学的持续发展。我们应知,只有持续的文物,才能有持续的考古学发展。因此,这两个持续当是我们的追求。从这十卷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认识的北京史

来看,一是我看到了北京考古学的成就,二是从当前文化建设来考虑,北京史本身确实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两三卷,也不是四五卷,而是长达十卷本的北京史。这篇幅巨大的北京史,体现了北京考古学成就的巨大。

这体现了北京考古学人巨大成就的北京史,引起了我们哪些思考?

一是要理解北京史,就得明白北京所处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环境。北京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地当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交界处,是面向欧亚大陆的中国西半部和面向海洋的中国东半部的连接地带。这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两类地理环境的位置。

二是北京是猿人演进为现代人的地区,很可能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转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地区。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暂无人涉及。因此,暂难言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族群文化的文化品性,存在如下应注意的文化现象:

其一,从新石器时代起,可以认为北京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或任何一种族群文化,就其文化构成来看,都是以一元为主的多元谱系的文化结构,即杂种文化。这种杂种文化乃是不同谱系的文化杂交产生的。所以出现文化杂交,乃是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结果。

其二,北京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和争夺的地带。有时,北京存在多种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文化割据并存的局势。有时,北京局部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文化的更替。有时,整个北京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更迭。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延续时间之短,和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同一族群文化更迭频率之快,乃是北京文化演进的一个特点。

其三,西周封燕,是北京历史上出现的大事。所以是小事,一是开始将北京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二是出现了政权和文化的新关系。西周早期,周王朝(或燕国)政治版图或政权统治所及,仅限于北京部分地区。在这部分地区内,文化则是多元的。到西周中期,燕国政治统治涵盖了整个北京。此种现象,相对于此前的文化“一本多元”来说,我们称之为“一统多元”,即政权一统,文化多元。直到春秋晚期,才出现了政权与文化的“一统一元”,即政权统一,文化一元。自此以后,这种“一统一元”和“一统多元”的更替,一直延续到现代,这是北京政治与文化的一个特点。同时,需指出的是,“一统多元”下不同文化或族群的居民,既存在聚居,又存在杂居的现象,就聚居和杂居关系而言,又存在大聚居、小杂居,大杂居、小聚居和聚居、杂居难分秋色等不同情形。这是北京“一统多元”政治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是我们论北京史者必须纳入眼帘的。

三是北京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步伐,大致同全国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步伐一致,即经历了中国的北京、亚洲的北京和世界的北京三大时期。所谓世界的北京,说的是北京自明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这使北京成为了世界的北京。除少数年代外,因为北京是这个时期中国的首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故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时的北京处于漩涡中心,走过的道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迂回曲折。现在该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

了,该冷静下来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什么是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我以往讲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八个字。所谓“传承”,是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吸收”,是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融合”,是将这两种优秀文化融合起来,如“中体西用”、“中西之间”和“西体中用”等等;所谓“创新”,就是在“融合”的基础之上,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创造出新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乃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这是被恩格斯所肯定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指出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在史前社会中就已存在,并呼唤在“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以“更高级形式”复活这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其实对中国来说,这种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也不是什么舶来品,这种文化已经以初级的形式存在于我国古代的氏族制度中,不过在我国由氏族制度社会发展为文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被民本思想和更恶劣的专制文化代替了,除保留一点痕迹外,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中。是恢复我们记忆的时候了!是从西方的文化中学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时候了!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来到中国大地时,中国文化的特色不会消失,而将如苏秉琦所说的那样,仍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相对独立区系,和世界文化的关系则如费孝通所讲,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时中国文化方显出勃勃生机。

是以为序。

張忠培

12-4-22 成稿於小石橋

## 前 言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延续未曾间断的历史名城,有着数十万年的人类居住历史,3 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年的建都史。漫长的发展岁月中这里积淀了极为广博深远的文化遗存,它们是北京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代表性文物遗迹,是数千年来北京从最初的原始聚落到今天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物证,而这些历史的印迹只有一部分见于文献典籍,绝大部分则尘封于地下,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去再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成绩卓然,展示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构建和诠释北京地区社会发展历史与城市变迁历史方面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

如果从1927年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算起,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基本建立了北京地区史前考古的文化序列。周口店遗址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及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址,证实50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其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继续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外,还新发现了一批史前文化遗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对推进北京地区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演进历程的探讨具有重要作用。据统计,北京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约48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墓葬和零散遗存点约4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在北京城区和多个郊区,共同构建了北京地区史前历史发展的脉络,为认识北京地区史前文化结构和研究不同史前文化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内容丰富,在反映北京文化内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地区三代考古的重大贡献是为西周初年封立“燕”、“蓟”二国及“燕”、“蓟”古城的探讨提供了实物资料。琉璃河遗址发现的燕都古城以及大量西周时期墓葬、车马坑和带有燕侯铭文的众多青铜礼器,印证了文献所载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和封召公于燕是信史,同时也弥补了文献记载的匮乏及不确定性,笼罩在北京古都城市历史起源上的迷雾正在廓清,“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愿望正在实现。而“玉皇庙文化”的发现则表明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北京地区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即位于北京南部的燕文化和位于北部燕山山地的“玉皇庙文化”。“玉皇庙文化”的发现独立地回答了文献资料所无法回答的历史问题,进一步展现了通

过考古学构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历史的可能。

北京地区秦汉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也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对北京史的认识。北京地区秦汉古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为研究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和北京地区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资料。北京地区城市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开展,基本究明了北京名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系列。古蓟城、西晋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等城市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为研究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和城市文化、生活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史料,考古调查与研究获的有关城池、建筑、街巷道路、宫殿苑囿、手工业生产作坊、城市的河湖水系等的各种实物资料丰富了北京史研究的内容。

金代皇陵、明定陵、清代园寝等帝王陵墓考古所取得的诸多重要成果,使人们对陵园分布、陵园布局、陵寝建筑、陵邑形制等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对于研究陵寝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汉代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一般墓葬的发掘,数量更是惊人。大量墓葬的清理及相关的墓葬考古研究,丰富了相关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资料,促进了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起到了考古补史、证史的作用。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以实物资料串联起了北京历史发展的链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北京城市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北京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北京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

北京考古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是北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与义务,及时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北京考古工作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能在回顾与前瞻、反思与总结中不断明确北京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编写了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希冀对北京考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促进北京考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本书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研究成果,并拥有全部著作权。宋大川作为主编,做了策划、组织和审稿工作;夏连保作为副主编,协调了本书的编写事务;史前卷由郭京宁著,夏商周卷由张智勇著,东周卷由王继红著,汉代卷由胡传耸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董坤玉著,辽代卷由于璞著,金代卷由丁利娜著,元代卷由孙勳著,明代卷由李永强著,清代卷(上)由朱志刚著、清代卷(下)由张中华著。

本书史前卷由吴加安先生审稿,夏商周卷由赵福生先生审稿,东周卷由靳枫毅先生审稿,汉代卷由信立祥先生审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乔梁先生审稿,辽代卷由齐心先生审稿,金代卷由陈平先生审稿,元代卷由魏坚先生审稿,明代卷由荣大为先生审稿,清代卷由李建平先生审稿。

特别要感谢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先生奖掖后学,欣然为本书作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先生大义,吾侪铭刻于心。

诚然,《北京考古史》的编写只是个初步的尝试,不足之处很多,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我们真诚地希望抛出这块粗砖,引来众多有识之士的美玉,从而快速推进北京考古研究的发展。

宋大川  
二零一二年五月



# 目 录

序 .....	张忠培( 1 )
前言 .....	宋大川( 1 )
绪论 .....	( 1 )
第一章 北京地区元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	( 3 )
第一节 北京元代考古发现概述 .....	( 3 )
第二节 关于北京元代考古的认识和研究状况综述 .....	( 8 )
第二章 元大都遗址及出土器物 .....	( 17 )
第一节 元大都城址的考古发现 .....	( 17 )
第二节 元上都、元中都遗址概况及元朝都城的比较 .....	( 38 )
第三节 元大都城址中的出土器物 .....	( 41 )
第四节 元大都城址外发现的遗址和器物 .....	( 65 )
第三章 北京发现的元代墓葬 .....	( 72 )
第一节 北京地区元代墓葬概述 .....	( 72 )
第二节 北京地区的主要元代墓葬和出土器物 .....	( 74 )
第四章 出土碑文、墓志等石刻文字材料的考释 .....	( 98 )
第一节 北京元代考古中出土的碑刻 .....	( 98 )
第二节 北京元代墓葬中出土的墓志、石函 .....	( 123 )
第三节 出土碑志与元代的政治和宗教 .....	( 159 )
参考文献 .....	( 161 )

## 插图目录

- 图一 元大都遗址平面图····· ( 19 )
- 图二 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 ( 21 )
- 图三 后英房居住遗址平面图····· ( 29 )
- 图四 西绦胡同居住遗址平面图····· ( 32 )
- 图五 龙凤纹扁壶····· ( 43 )
- 图六 鱼纹盆····· ( 43 )
- 图七 白釉褐花凤纹大罐····· ( 43 )
- 图八 白地黑花诗文盖罐····· ( 43 )
- 图九 青花凤首扁壶····· ( 44 )
- 图一〇 青花盏和盏托····· ( 45 )
- 图一一 青花觚····· ( 45 )
- 图一二 青花龙纹碗····· ( 45 )
- 图一三 青花葵花盘····· ( 45 )
- 图一四 青花雕塑婴戏鸟食罐····· ( 47 )
- 图一五 青花束莲纹梨式壶····· ( 47 )
- 图一六 青白釉瓷笔架····· ( 48 )
- 图一七 青白釉执桃童子像····· ( 48 )
- 图一八 乳钉刻划莲纹三足炉····· ( 49 )
- 图一九 刻划牡丹纹双耳扁壶····· ( 49 )
- 图二〇 饕餮纹双耳三足炉····· ( 49 )
- 图二一 钧窑水盂····· ( 53 )

图二二	钧窑双耳瓶·····	( 53 )
图二三	镂空三彩龙凤纹琉璃釉香炉·····	( 55 )
图二四	后英房居住遗址中出土的螺钿片·····	( 61 )
图二五	白地黑花双凤罐·····	( 67 )
图二六	青白釉观音菩萨像·····	( 69 )
图二七	释迦牟尼佛坐像·····	( 69 )
图二八	骑狐观音菩萨像·····	( 69 )
图二九	仿古龙纹三足索耳鬲炉·····	( 70 )
图三〇	“内府官物”漆盘·····	( 70 )
图三一	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全景·····	( 75 )
图三二	“白王”高足杯·····	( 76 )
图三三	汉白玉天马·····	( 76 )
图三四	生辰俑·····	( 76 )
图三五	仆役俑·····	( 77 )
图三六	陶龙·····	( 77 )
图三七	陶骆驼·····	( 77 )
图三八	神仙故事铜镜·····	( 77 )
图三九	许由巢父铜镜·····	( 77 )
图四〇	“千秋福寿”双鱼镜·····	( 77 )
图四一	四乳“家常富贵”铭文镜·····	( 78 )
图四二	张弘纲墓平、剖面图·····	( 80 )
图四三	青白釉多穆壶·····	( 87 )
图四四	青白釉玉壶春瓶·····	( 87 )
图四五	青白釉瓷匜·····	( 89 )
图四六	玉壶春瓶·····	( 89 )
图四七	三足炉·····	( 89 )
图四八	卧足碗·····	( 90 )
图四九	沈家营元墓墓葬平、剖面图·····	( 90 )
图五〇	沈家营元墓随葬器物图·····	( 90 )
图五一	沈家营元墓出土的铜镜·····	( 90 )
图五二	河北村M1平、剖面图·····	( 91 )
图五三	河北村M1全景·····	( 91 )
图五四	四系瓶M1:2·····	( 91 )
图五五	四系瓶M1:3·····	( 91 )
图五六	钧釉碗M1:4·····	( 91 )

图五七	白地黑花碗M1:5	( 91 )
图五八	河北村M2平、剖面图	( 92 )
图五九	河北村M2全景	( 92 )
图六〇	白地黑花碗M2:4	( 93 )
图六一	白地黑花碗M2:4的内侧	( 93 )
图六二	M2铜钱的拓片	( 93 )
图六三	河北村M3平、剖面图	( 93 )
图六四	钧釉碗M3:2	( 94 )
图六五	钧釉碗M3:4	( 94 )
图六六	河北村M4平、剖面图	( 94 )
图六七	河北村M4全景	( 94 )
图六八	四系瓶M4:3	( 95 )
图六九	四系瓶M4:6	( 95 )
图七〇	钧釉碗M4:4	( 95 )
图七一	钧釉碗M4:5	( 95 )
图七二	青釉盘M4:7	( 95 )
图七三	双耳罐M4:8	( 95 )
图七四	铜镜M4:2	( 95 )
图七五	河北村M8平、剖面图	( 96 )
图七六	河北村M8全景	( 96 )
图七七	四系瓶M8:2	( 96 )
图七八	四系瓶M8:8	( 96 )
图七九	白地黑花碗M8:5	( 97 )
图八〇	白地黑花碗M8:11	( 97 )
图八一	白釉碗M8:6	( 97 )
图八二	白釉碗M8:7	( 97 )
图八三	海云禅师墓志碑拓片	( 99 )
图八四	大都兴隆寺置地碑	( 119 )
图八五	耶律铸墓志拓片	( 125 )
图八六	郡主夫人奇渥温氏墓志	( 134 )
图八七	张弘纲墓志盖	( 137 )
图八八	张弘纲墓志	( 137 )
图八九	铁可墓志志面	( 150 )
图九〇	铁可墓志盖底	( 150 )
图九一	耿完者秃墓志	( 157 )

## 插 表 目 录

表一 文献记载元大都坊名对照表····· (23)

## 绪 论

1206年,铁木真在鄂嫩河源建立大蒙古国,声威益振,势力渐强,之后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东征西讨,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诸汗,亡夏、金,灭西辽,降土蕃,征西亚,入欧洲。至忽必烈时,建立元朝,正式定都北京,并于1279年最终灭亡南宋,完成了全国规模的大统一。元朝的统一,结束了我国封建历史时期由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割据、政权对峙的局面,对南北方经济的恢复、文化的交流、科技的发展、民族的融合等等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统一与交融的大环境之中,创造并产生了缤纷繁盛的“大元”气象。作为元朝政治象征的都城——北京,元大都所在地,正式成为封建统一王朝的国都,成为中西交往、南北汇集的中心区域,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历经明清,直至今日,元代北京的历史遗迹所剩无几,往昔风貌难以详窥。幸而建国之后经过考古工作者们的多年不懈努力,在元大都城址、内部的居住遗址、宗教活动遗址、窑址、墓葬等等的考察、发现以及整理、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为我们真实地了解、复原元代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活等提供了大量丰富且翔实的珍贵材料,有助于推动并深化对元代北京历史面貌的认识和探讨。元大都的设计、规划和修建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元大都三城相套而成的重城式结构是自汴梁城以来的新形式;其开放式街巷制的道路系统则彻底改变了唐长安城的方块形的里坊制街道系统;中轴线更为明确,且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可以说元大都的建筑形制,上承唐宋,下启明清。蒙元时期,先后建立了三座都城,比较之下,元大都的面积、规模最大,功能最为完备,蒙古皇室居住、使用时间最长,充分展现出帝国京师和国际化都市的特点和性质。

元大都规模宏大,功能完备。作为元朝都城,中西往来频繁,南北交流畅通,为保障粮食供给和商品贸易,开凿了大运河,北段的终点就设在积水潭。水路的贯通,为元大都商品交易的兴盛、人们生活的丰富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元大都城址内外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其中很多是来自南方景德镇诸窑、龙泉窑等著名窑场的产品,其数量和质量大大超出了北京地区辽金时期的发现。

元代对于各种宗教都采取了优待和扶植政策,尤其是佛教和道教,根据史料典籍的记载,元大都城内外寺庙、道观林立,遍布各处。海云禅师塔基的发掘,大延洪寺栗园碑、兴隆寺置地记碑的出土,以及福寿兴元观遗址和相关碑刻的发现,见证了北京地区元代宗教的发展状况。

在历史时期的众多考古遗存中,墓葬具有分布广泛、内涵丰富、时代延续性强等特点,因此是非常重要的—类古代文化物质遗存。墓葬的发现是北京元代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数已有数十座之多,原始材料的积累日渐深厚。在各类型墓葬中,包含有丰富的随葬器物、绚丽的墓室绘画及精致的雕刻物品。将这些元代墓葬资料承载的历史信息加以归纳、整合,或从不同角度进行细致划分,将会使我们更加真实、全面、多方位地了解元代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为少数民族,为了更好地控制疆域、巩固统治、稳定庶众,蒙古贵族尽可能地招揽各个民族、不同地区的精英人物,任贤用能。耶律铸、张弘纲、铁可、耿完者秃等人多数为蒙元时期的中高级官吏,虽然具有不同的家族背景,但均成为元朝统治的重要支柱。其墓葬的发掘,随葬器物的发现,墓志的出土,为了解、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此外,元大都城址内还发现了大量平民的墓葬,为我们了解当时—般群众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等提供了大量素材。

## 第一章 北京地区元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元朝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1206年,铁木真在鄂嫩河源召开忽里台,加尊号为成吉思汗,正式建立了大蒙古国。1214年5月,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下,金宣宗感到难以支撑,仓皇携带百官和后宫出逃,迁都南京(汴梁)。仅仅一年之后,金中都被落入了蒙古军队的手中。1260年,即中统元年,忽必烈即汗位,建立元朝,1272年,定都于北京——大都。《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载:“故其地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疆域广大,超越汉唐;“(至元二十七年)于是南北之户总书于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sup>[1]</sup>人口众多,可谓极盛。北京是元朝的都城——元大都的所在地,成为整个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南北荟萃,四方云集,还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闻名世界,包容中西。因此,元代的北京是一个物质文化相当丰富,各类人群频繁往来的地区。探求当时北京的社会状况和文化面貌,应当是极具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重要课题。开展这样一项广泛而复杂的研究,除了依赖流传至今的纸本历史文献和各类铭刻等文字性的记载以及艺术图像性的资料——绘画、雕塑等之外,还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考古发现与研究在学术上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不仅可以起到补充文献记载不足的作用,从而大大地丰富、开拓人们的视野,还能够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认知,还原其本来的面貌。因此,北京地区元代考古的发现以及进行的相应研究是我们现在与将来认识和研究元代北京社会必不可缺的方式和途径。

### 第一节 北京元代考古发现概述

考古发现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相关的考古学研究都是以之为基础和中心而展开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考古发现是考古学研究的命脉,没有考古发现的研究,就只能如同空中楼阁一般,是虚幻而没有价值的。因此,北京元代考古发现是本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起点和基础,在此过程中揭露出的各类遗址、发掘出的大量文物展现给世人一个多彩且震撼的历史画卷,其价

[1]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2005年,1345、1346页。



值可想而知。

对于元代历史文物,早在明代就有所发现。据明代沈德符所撰《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明神宗万历年间,蒙元的开国功臣耶律楚材之墓曾被人无意间发现,“近日一友人治别业于京师外西山,忽发一冢,开椁得大头颅,加常人几倍,不知何人葬地……未几掘得碣石,则楚材墓也。虽稍为葺治,闻坟中他物散去多矣”。<sup>[1]</sup>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知耶律楚材墓很可能已遭破坏,墓志类的铭刻和其他一些文物被发现并流散,该墓葬的形制、规模、大小以及随葬器物等情况,我们如今已不得而知。另外,对于元朝遗留下来的一些器物,受到后人的长期关注,如现存于北海公园前团城内的渎山大玉海<sup>[2]</sup>就是最好的例证。“(至元二年十二月)己丑,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sup>[3]</sup>“元朝万岁山广寒殿内设一黑玉酒缸,玉有白章,随其形刻鱼兽出没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sup>[4]</sup>“承光殿南有石亭,以置元代玉瓮。瓮径四尺五寸,高二尺,围圆一丈五尺。高宗纯皇帝诗序云,玉瓮为金元旧物,嗣沦没古刹中,以贮菜菔。后购得,乃于承光殿前起一小亭置之。”<sup>[5]</sup>

正式的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延续至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考古、文物价值的成果。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具体情况,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北京地区元代考古发现、发掘的兴起时期,主要成果是元大都遗址的勘察、发掘以及一批重要墓葬的清理,学界对北京地区元代遗址和墓葬有了初步认识和判断;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期,是北京地区元代考古发现、发掘的发展时期,考古发掘的主要成果是元代墓葬的清理,对相关遗迹的研究有所深入;第三阶段为2000年至今,是北京地区元代考古的兴盛时期,发掘的元代墓葬较多,出土的器物更为丰富,对相关遗址、墓葬和各类器物的综合性研究更加广泛,角度更为多样。

## 一、第一阶段考古发现的主要成果

1952年,容肇祖先生在安定门东侧的明代城墙墙基下发现《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一块<sup>[6]</sup>。

1955年,发掘了双塔庆寿寺塔基<sup>[7]</sup>,发现了埋葬海云禅师骨灰的石函。

1959—1960年2月底,北京市文物工作在昌平区白浮村发掘了4座元代竖穴土坑墓<sup>[8]</sup>。

1962年12月,在崇文区龙潭湖北吕家窑村发现了铁可墓;1963年10月,在同一地区又发

[1]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97年,714页。

[2] 周南泉、王名时:《北京团城内渎山大玉海考》,《文物》1980年4期。

[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中华书局,2005年,109页。

[4] (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35页。

[5] (清)阙名:《日下尊闻录》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78页。

[6] 容肇祖:《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发现记》,《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1期。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8期。张宁:《关于京畿都漕运使王君去思碑》,《首都博物馆丛刊》1983年2期。

[7] 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北京市双塔庆寿寺出土的丝棉织品及绣花》,《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9期。刘秀中:《元代棉织僧帽》,《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

[8]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白浮村汉、唐、元墓葬发掘》,《考古》1963年3期。